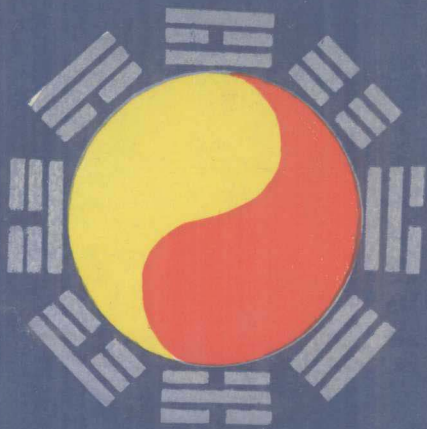


刘士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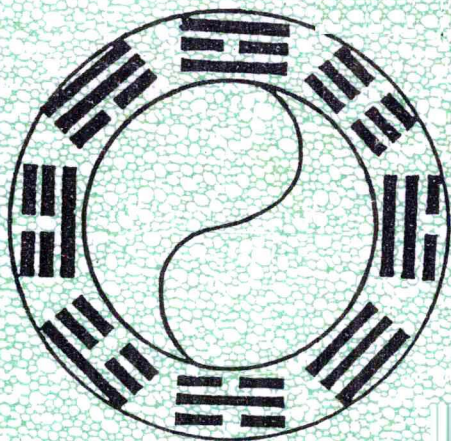


中国诗哲论

ZHONGGUOSHIZHELUN

济南出版社

刘士林 著



中国

ZHONGGUO

哲论

LI ZHE LUN

济南出版社

序

浩浩阴阳移，生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发自汉魏的生命咏叹确乎很能表达中国古典诗学的精神情怀。俯仰天地，品类万物，而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光阴里，又必须经受种种深悲极乐、生离死别和得失浮沉。也可以说，又只有这些悲欢际遇对个体来说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就销磨在其中了，哪怕有时这些事情事物对社会和历史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之，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及它的美学气质，可看作这本《中国诗哲学》的“逻辑—情感”起点。

从理论构架方式来看，这本书的探索性很强。在宏观角度上，作者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认为与统一的文化形态相应，必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而古典文化的精神方式就是古典诗学。作者认为：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不言而喻这幅精神图景是相当迷人的。

郁郁乎文哉。在繁杂庞大的中国诗性文化中，作者谨慎地选择了一些诗人代表。为了区别于一般的“乡原”诗人，他称他们为“诗哲”，他们的哲学价值，是因为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

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结构和特殊的高峰体验，而正是这些诗人，以其诗的本体结构，使它们得以在历史长河中凝结、建构和“出场”。而当代理论思维只要“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也就等于把握住了古典精神方式的历史结构，同时也就等于把握住了古代中国文化的本体。就此看来，这种既注重“结构”，又注重（结构间的）历史统一性的诗学研究方法，是很有理论气势的。

书中显示出，古典的精神方式，始于庄子，而清算于鲁迅。在漫长的年代里，它既给中国文人以慰藉和温情，又束缚、“特化”了他们的机能，使古典文士只能与其文化的本体共存亡。这是一个圆整的精神行程，也是一种对古代社会史的诗学“复制”。这种兼文化、历史、哲学的把握方式，在中国诗学的研究中，应该说是很少有过的。虽然这本书在一些细部尚嫌粗糙，欠周延，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处，但对古典诗学与古典文化，无疑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深层剖析。

本书的作者只有26岁，大学时代曾以诗集《太阳雨》名。现在他虽然很少写诗了，但那种诗人的悟性和情绪在书中仍随处可见。而且这还只是他对古典诗学的初步探索，一下子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作者还强调地表明：论古在于知今，对古典文化的精神实质的澄清和把握，在于深究古典文化与当代人精神的本质联系。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当然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本书的思想基础构成中，除了马克思、列宁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外，它还吸收了汤因比式的宏观进化论的历史学方法，也吸收了现代本体论哲学的诸多成果，以及庄子哲学的生命观，并将它们批判地综合进历史唯物论的框架内。这也可看作对微观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别样的尝试。书中有很多部分，如庄子与原始文化人类学，屈原对古典文化“时空感知”的开掘，陶渊明的“自然本体美学观”，魏晋名士的“清谈”与存在主义语言学理

论，纳兰性德的“忧郁”与海德格尔的“畏”等比较研究，都颇具特色，开卷有益焉。

东方风来，好雨发生，这一株学术的小草，以它的坚韧和刻苦的努力，将汇入祖国文化的百花园中，这实在可喜可贺。十年树木，愿我们年轻的作者取得更大的进步。是为序。

王振铎

1992. 4. 于河南大学

目 录

序	王振铎
绪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	(1)
一、精神方式	(1)
二、诗性文化	(4)
三、诗的情结	(7)
四、天地之心	(11)
五、《诗经》：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19)
六、历史冲突	(22)

上篇：本体论诗学导论

第一章：我存在的本体	(31)
一、烟云往事	(31)
二、存在与虚无	(34)
三、欠缺与永恒	(40)
第二章：诗的本体论结构	(45)
一、诗是什么	(45)
二、诗如何是	(50)
三、诗的本体论结构	(54)
第三章：“自然历史过程”	(60)
一、有关论述	(60)

二、一种信念·····	(64)
三、苦难的历程·····	(68)

下篇：中国诗哲的本体论诗学研究

第一章：试探庄子的智慧发生·····	(75)
一、绪论·····	(75)
二、庄子的《庄子》·····	(76)
三、黄金时代寻梦·····	(84)
四、痛苦的智慧·····	(90)
第二章：试析屈原的宇宙意识·····	(97)
一、绪论·····	(97)
二、青铜心态·····	(100)
三、诗言志·····	(108)
四、智者与水·····	(113)
第三章：试会嵇康的本觉真心·····	(117)
一、绪论·····	(117)
二、变徵之音·····	(118)
三、东方“拉奥孔”·····	(124)
四、林无静树 川无停流·····	(130)
第四章：试思陶渊明的自然本体·····	(133)
一、绪论·····	(133)
二、归去来兮·····	(135)
三、五柳先生和桃花源·····	(139)
四、平淡 自然 本真·····	(143)
五、回归自然简议·····	(146)
第五章：试论李白的酒神精神·····	(148)

一、绪论	(148)
二、中世纪的浪漫骑士	(150)
三、立德 立功 立言	(154)
四、酒神的歌声	(159)
五、痛饮生命之华筵	(163)
第六章：试评杜甫的日神精神	(165)
一、绪论	(165)
二、酒神的式微	(166)
三、隐忍、负重的道德哲学	(169)
四、为经为骚复为史	(174)
五、形式冲动	(178)
第七章：试谈苏轼的存在哲学	(181)
一、绪论	(181)
二、承平时代的悲剧人生	(183)
三、超世入世观	(188)
四、游于艺	(191)
五、人间有味是清欢	(195)
第八章：试窥纳兰性德的忧郁本质	(199)
一、绪论	(199)
二、便无风雪也摧残	(201)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08)
四、进亦忧 退亦忧	(213)
第九章：试解曹雪芹的虚无情综	(218)
一、绪论	(218)
二、顽石 宝玉 生命本体	(220)
三、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	(226)
四、此在的苦难和永恒	(233)
第十章：试悟鲁迅的悲剧知识	(240)

一、绪论	(240)
二、“悲剧的知”之成熟	(242)
三、人性之坟	(247)
四、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	(251)
五、敢有歌吟动地哀	(258)
结语：思想史与诗学史	(261)
一、“命运的谜语”	(261)
二、思想史与诗学史	(263)
后记	(267)

绪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

一、精神方式

与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共存亡，必定有一种统一的人（族类）的精神方式。^①源远流长，而且必将生展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②其精神方式究竟表现为什么呢？过去有诸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乐感文化等等说法，它们当然也都把握住了其部分特质，但还都不能看作是对传统文化精神本体的把握。正如海德格尔在谈论科学时所指出的：“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样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③这种文化的精神本体也必定以精神的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本体的那种存在、那种结构、那种方式，我是这样看待它的：在我们民族的文化结构中，它首先是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库而存在的，其中储存了各种有着必然联系、相生相克，并必将随着历史发展而物态化、现实化的文化因子或精神潜能，它们在外化、展开前，是以一种高度统一的表达方式，共同构建了人类原初生活和精神的统一、合谐。随后在该民族漫长的历史行程中，这个基因库里的各种文化因子纷纷在现实提供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粉墨登场，使尽解数，“尽性”后，薪尽火传，被其它更新的精神潜能、更有生命活力、更能适应生存环境，也因而更加优化的文化基因所取而代之。而这种新的基因，也必定以与前者

① 参阅本书《“自然历史过程”》一章。

② 本书采张岱年说：传统文化即封建文化。

③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第15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有着血脉联系的精神方式表达自身。而且，作为一种类似有机体生命过程的文化的进步与成长，其精神方式必定也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花繁叶茂，青春似锦，尽得天下之美，从而一跃达到该种文化的峰顶，然后就日渐衰老下去，直到一种新的文化及其精神方式在它的夕阳残照中诞生。也只有这样的事物，才能担起我所谓的文化本体称谓。也只有这种文化本体，才能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

运用这种文化本体观去观察中国传统文化时，心有灵犀，我们就会一把捉住那些长期围绕我们心灵和思想的精灵或幽灵，而毫不迟疑地说：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总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我们民族的精神本体主要是以诗的方式来表达的。其中虽有沧桑变迁，但改变的只是形式、外观，而其深层结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重大变异。王国维先生曾谈到过中国文化诗本体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变更情况：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化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

当然，这里线索大致是清理出来了（但若依本书观点，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方式的必然行程中，接着词这一表现形式的应该是元曲、明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但结论却未必深刻、全面。文学艺术的兴衰、消长，新旧交替，一般除去我们过去已烂熟的物质现实基础的制约外，就精神本体的精神方式而言，仍有着特殊的、与物质方式不同的精神规律，这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而且我们认为，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精神本身的特殊规律（精神方式）造成的，在物质生产方式不发生重大变迁的社会中（如中国封建社会），这种精神自身的作用似乎要更大、更直接和更具有决定性。因此，王国维先生所谓的“通行既久，染指遂多”和难出新意，则只是相当表层的原因。其“始盛终衰”的深层必然性则正表现了一种文化基因由生意盎然到红颜枯槁这样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说明了，一个文化本体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所有的基因，经过各种方式的努力和建构后，都不得不纷纷退下历史舞台这种历史运动的自然必然性。^①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势”：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

这里所谓的“势”，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今天，将这种自然必然性转化、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必然性，即自觉地意识它，把握它，为推动社会进步作积极努力，则应是一代新知识者的历史使命。本着这个目的，本书将围绕中国诗性文化及其精神方式展开探索，以求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艰难历程，并从精神方式的角度回答其历史原因。

^① 参阅本书（“自然历史过程”）一章。

二、诗性文化

从精神方式入手，前文在粗糙的描述中，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样一个新问题。它还可以继续表述成：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诗”为精神本体的一种文化形态。从诗的本体论角度，可以更深刻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和衰落、喜剧与悲剧的根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等实体性文化形式不同，它是以更深邃的方式规定、制约着中国的历史命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恰恰是伴随着诗本体这一精神方式而诞生、成长和消亡的。《诗经》曾记载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原始生活，《全唐诗》则以浩繁篇幅记载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情景，同样，这一精神方式也以一曲《红楼梦》来宣告了“诗与美”的最终破灭、本体的白茫茫大地般的虚无和传统文化凄惨暮年的到来。在中国的封建历史学中，才真正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所谓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高级的东西。中国人对诗有着一种特殊的、近乎本能的联系，这就是它的文化功能意义。

现在来谈一下如何理解诗性文化的概念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精神方式的角度入手。文化，众所周知，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莫一是衷的概念。本文主要讨论其精神层面。当然任何精神文化都有其物质基础。这方面诸多学人都都精研细究过，此处从略。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精神发展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在一种相对统一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下表现为一种统一的过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使我们尤其可以用统一的过程看待传统文化。本书上篇第三章还将论述，可参），精神方式在各阶段的传承、关联、转化、飞跃等特殊性的进行考察，唯此才能更细致、更真实和更为完整地认识，理解精神自身的历史

运动。现在暂且将“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悬置起来，从精神方式来看待精神自身，也能更多地把思维凝注在人的心灵、情感、精神结构之上。

而精神的本源、生物基础则在于人脑的思维结构。这个思维结构虽然是在漫长的人类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一经形成，就具有了独立存在意义，人类可以直接从遗传中获取到它。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而且它还可以说是人类与大地母亲同命相联的脐带或无线导体。在大脑这高信息空间、这黑箱内部，应该也必定珍藏着以往全部的宇宙历史和人类历史的信息形态。因为人类是宇宙自然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是已过去的全部运动、变化和过程的集合，只是对很多遗存的密码，我们目前尚未能认识或无法破译，才使我们无法弄清生命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历程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再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假如当回复倒退到足够的程度时，它还会出现。”^①因此，除了精神方式角度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去看待精神的历史运动。

从发生学的角度入手去把握文化的精神方式，我们认为有两点最值得重视。一是该文化的精神本源，种族基础，或者说种族的大脑思维结构。这样除却我们现在理解生命的精神问题经常运用的“哲学思维”、“美学思维”外，要更多注重原始思维的特殊性格和特殊结构。它是任何一个文明民族最为基本的文化基因，而且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全部过程。它还是早期民族文化的基因库，而民族文化则是它的历史展开，它以最为内在的方式规定、制约着其文化的命运。在人类生活的分化、分工和社会演化进程中，它始终作为一个基础存在着，支撑着作为它的内在潜能而物态化的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傅雅芳、郝冬瑾译《文明及其缺憾》第7—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各种文化产物。与之相比，单独研究自我意识的哲学思维、单独研究审美意识的美学思维，乃至现在对原始思维已有的研究都显得相对要偏狭一些。而只有把握住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思维，采用人类学的诸种成果，才能真正把握住一种文化的精神本体。

关于原始思维，维柯在其所著的《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原始人由于推理力弱、想象力强，所以都是些用“诗性文字”说话的诗人。因此，荷马史诗的真正作者并非盲诗人荷马，而是荷马时代所有的人。他将古代人的思维和精神方式称为“诗性智慧”，古代各民族都是以“诗性智慧”的方式创造了最初的文化模式。维柯甚至还发现了：“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起源：也就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从这种粗浅的玄学中一方面发展出也全是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①这是维柯思想中最闪亮的地方。抛开他研究中有时故意披上或意识中残余的神秘色彩，这段话相当明确地指出，古代文化，尤其是原始文化，大都是一种用诗性智慧创造出的诗性文化。这段历史被维柯称为“诗性历史”，它与马克思曾指出的各民族早期共同经历的神话阶段，在精神特征上是极为一致的。现在，对世界早期各民族文化大致可推演出这样一个原则：诗性智慧是早期各民族诗性文化的基因库（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印度也有《梨俱吠陀》），而诗性文化则是诗性智慧的历史展开。在这个展开过程中，只有中国古代文化，由于其亚细亚式的社会结构，得以全面、独立地延续和发展起来。这就牵涉到从发生学角度把握精神方式的第二点，就是早期经验对形成一个民族精神方式的重要意义。下文将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材料进行一些探索。

^①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英译者的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着重号为作者加。

三、诗的情结

维柯曾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西方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则承接了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继续存在着，唯有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个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本质。”^① 这种观点虽初看起来颇具决定论色彩。我个人认为，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持任何决定论观都难免显得机械和独断，但就某一特定的精神方式而言，则可能正是我们把握它的得力武器。尤其在我们考察人类早期精神时，因为此时人的主体性存在和文化功能未能独立并形成象现代这样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受生物性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中国的诗性文化，其实在它的起源处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规定了。或者说，在中华民族的童年时期，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就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诗情结。

这个诗情结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原始思维遗传下来的诗性智慧。综合维柯、列维·布留尔、斯特劳斯等提出的人类学思想，大致可以推断出这种思维是非常情感化的或本能的，非逻辑的或前逻辑的，神话的或诗的。这种诗性智慧在任何民族中都从未完全斩断过，只是在文明社会中很多时候它转化为诗人艺术家进行想象和创造的原动力，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柏拉图所谓的灵感迷狂，中国文学艺术所看重的直观顿悟，都不是凭空而来，只能从这里找到它发生的历史根据。对于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先验的精神存在。

另一方面则要从人类早期经验，或者说在文明发初期中的精神体验和价值取向上找到根据。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程中，原始

^① 米夏埃尔·兰德曼著，张乐天译《哲学人类学》第16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思维，或者说诗性智慧逐渐解体，理性的、逻辑的、科学的萌芽开始绽露，然而不同的文化对这些萌芽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中国的古代神话和古经传，可以说就是一种非科学的、玄学的奇思异想，其中大量保存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同样在古希腊，也有过壮丽的奥林匹斯神话世界，但经过“智识即美德”的苏格拉底时代，便异常悲壮地消失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悲痛，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可见一斑。明丽的阳光，健康的情欲，诗性的崇高，都日益被一种矫情的、疲惫的、世俗的生活淹没。“在这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古老力量，尽管它只在非常时刻有力地萌动一下，然后重又沉入酣梦，等待着未来的觉醒。”^①而以尼采为发端，蔓延至今的西方反理性运动，可以说都是古代诗性智慧一次次苏醒的结果。海德格尔甚至认为西方人对存在的思考自柏拉图后就误入歧途、晦而不明了。这也是因为诗性智慧与人类智慧相断裂而造成的，所以他才要努力使哲学变成诗，变成反理性的诗性思维，唯有如此，才能拯救已不再“思”的西方形而上学。而在古代中国，却没有发生这种文化变异。这种诗性智慧不仅没有受到来自科学和理性的挑战，这种旺盛的想象力不仅没有受到知性的改造，这种诗性文化不仅没有受到文明进程的摧残，反而由华夏先民以异样的热情肯定下来。^②这就是我们祖先对诗那种超乎一切的重视和崇尚。当古希腊智者柏拉图轻蔑地挑剔着荷马史诗的非理性和伤风败俗，严格地区别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时，在中国，诗却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地位。虽然孔子也曾删诗，但

^① 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第10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② 而在古希腊，公元前六世纪曾有过“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柏拉图）。这是希腊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宇宙学者和智者，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对《荷马史诗》所代表的诗性智慧的一次文化围攻。参阅吉尔伯特·库恩著《美学史》第9—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